

试论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地位

刘石吉

一

郑观应(1842-1992)同近代许多著名的买办商人及改革派人物如唐景星、徐润、孙中山、容闳一样,都是广东香山人,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与西方接触的地区之一。郑观应幼读诗书,且曾一度参加考试,惟“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从家叔秀山学英语”。秀山为一买办,观应旋入英商宝顺洋行供职,宝顺倒歇后,仍留沪经商,历任和生茶栈、和生祥茶栈、公正轮船、荣泰驳船公司等职,皆与洋行业务有关。1873年受聘为英商太古洋行之买办,1882年离开洋行,任李鸿章所创办之轮船招商局帮办、会办。郑氏虽久任职洋行,但对国家局势始终关怀,能利用与外人接触之经验,及在上海阅读新刊书报之机会,益以本人之观察运思,形成一套救时方案,也成为近代杰出的改革派思想家。

硕学买办郑观应的思想最鲜明说明了买办对西方作出反应的方式,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而名噪一时。从文化思想上说,郑氏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买办,他是当时最进步的改革家之一。从他的主要著作《救时揭要》(1862写成),《易言》(1871写成,1880出版),《盛世危言》(1893发表),可以体现出来。此外,还有诗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及《盛世危言》的两个续篇。《盛世危言》曾呈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令总理衙门刊印分发给各官员。此书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风行一时。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喜欢的读物之一,也大大影响孙中山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的主要思想和文句格式。此书内容之广泛性与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实无可比拟。

郑观应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兼为洋务企业的要角,所谓“一身

四任”者。对这样一位超越时代的先驱人物,前贤的研究论述已多,均具体而深入,其成果可说丰硕美满,实在很难再作突破创见。就笔者所见,夏东元教授是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专家,特别是他大量利用上海图书馆有关郑观应的未刊资料及盛宣怀档案资料,完成了郑观应全集及传记的整体研究。海外学者刘广京、日籍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对《易言》的探索介绍及深入研究,美籍学者郝延平教授对买办商人及郑氏的专题论述,均有甚多创意与价值。其他国内外相关研究则不胜枚举,本研讨会相关论文多已提及,此处不再重复。这里仅就郑氏在近代改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从一个较宏观的视野,略作比较及综合的诠释与评价。

二

中国近代的“商战”观念最早见于1862年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尔后李瀚章、薛福成相继于1878、88年提及,直至晚清,盛宣怀、刘铭传、康有为、何启、胡礼垣、王韬、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徐勤、麦孟华、严复、张謇等朝野人士均有论及,至1917年更有黄炎培《中国商战失败史》出版。但其中最系统提出的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有专论商战2篇,商务5篇,商船2篇。

郑氏揭橥“富强救国”,主张“兵战”不如“商战”,以为国家设公使领事,议订条约,实一切为本国商利而设;主张“大开门户”、“万国公共商场”,但法权操之在我;以为订定海关税则为当世各国关权公例,反对“利益均沾”之最惠国待遇,呼吁收回利权。另一方面,他主张开设农工商专门学堂及驾驶学堂,各使人材日出,百艺俱兴,税由自理,庶几漏卮可塞,富强可望。

又主专厂制造机器,改造土货;力主仿西法创设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1896年盛宣怀奏请创立中国银行,其制同於郑氏所议),又论及国债之发行及货币行钞之便行。更首议创设商部(1903年实现)于六部之外。他强调“恤商、助商、保商、护商”,一再认为政府应主动争利,主张充实“商智”、“商术”,议创格致书院,为商人辟科考之途,重视商人教育,提高商人地位。他不但是晚清买办商人中最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者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商人中,能使本阶级的思想观念合理化的第一人。

三

晚近学者论述发展中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一般认为第一个层次大致表现在技术的近代化(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再进入第二层次制度的近代化(Institutional Modernization),最后达到意识形态的层次(Ideological Modernization)。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郑观应对于改革制度的主张,有其时代的进步性。他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不是早期“师夷长技以制夷”论者,也不似洋务派中体西用论者;他对政治制度议会政体的主张,比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言论更早,也可能更为稳健。他已经脱离了鸦片战争以来有关“师夷长技以制夷”及早期“船坚炮利”,发展军用工业的主张,而进入到制度变革的范畴。其显著特色是对议会制度和商业、工业的极端重视。在早期著作《易言》中首度提出这一概念,而1884年中法战后,他更明确地建议政府设置议会制度,这比90年代汤震、陈虬更为先进。他建议引进国际法,主张强硬的国家主义与谨慎的对外政策相结合,也向中国传统某些价值观念,如家族主义和官吏的职责万能等提出挑战。

清末知识分子本于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思想中,可以自强运动的过程来试作分析,它可以说是一系列由“求强”至“求富”的过程:从早期的讲求“船坚炮利、垒固兵强”,注重军用工业,到发展工商业,普遍兴建机器局、纺织厂、铁路

等民生工业的主张,郑观应的富强救国与富民思想亦不外于此。但郑氏在他的著作中,更以充满人道主义的感情,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弊病,特别指出缠足、文盲、不人道的滥刑监禁及农村贫穷惨况。他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包括济贫、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改造、流民犯人的劳动改造、女权、女教、工业化及农业和法律的改良等。或许我们可以说,郑氏已有了社会主义改良思想的初步雏形,这在近代改良思潮“求强”、“求富”至“求均”的历史脉络中,应该有其一定意义。

夏东元先生说,“郑观应是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的。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民主与科学。……在他的脑子里已孕育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早期的改革派思想家如魏源、梁廷桢、冯桂芬、洪仁玕对此有一些含糊的思想,但郑观应无疑是较早提出在中国实行这种政治改革的思想家。这是很确当的评价,也是郑观应以后世代代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所应反思的课题。

注解:

- ① 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编校《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②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 ③ 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④ 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 ⑤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科院,1988)(原书为英文,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
 - ⑥ Yen -ping Hao,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IX, no. 1 (1969)
 - ⑦ 刘广京《郑观应 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清华学报》新8卷1、2期合刊(1970年8月,台北)
 - ⑧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
- (本文作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